

国际体系转型与美国—塔利班关系

钮松*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处于一种大变动、大动荡的局面之中。本文沿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梳理了与之相对应的美国—塔利班关系走向的3个阶段,即间接支持及有限接触时期(1994至2001年)、严厉打击时期(2001年“9·11”至2009年初)和交好“温和塔利班”、打击极端塔利班时期(2009年迄今)。国际社会已进入“一超多强”且“一起衰落”的新时期,美国—塔利班关系的未来走向与公正合理中东政策的制定以及引导伊斯兰世界融入国际体系这两大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 国际体系转型;美国;塔利班;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7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2010)02-0036-08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便处于一种大变动、大动荡的局面之中。国际体系的总体表现为:“贯穿历史,国际体系在稳定与不稳、和平与战争之间徘徊”。¹ 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催生的雅尔塔体系奠定的美苏合作主导下的“国际四警察”很快便向“五强”转变,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设立上。国际体系虽然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其内在格局却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及由此而来的作为五常之一的中国的政权更迭加深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不信任并最终导致美苏争霸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的形成。虽然雅尔塔体系所设定的美苏合作很快演进成为美苏对抗,但对抗没有进一步演化成两个超级大国直接的军事冲突,两大阵营保持了数十年的冷和平状态。在雅尔塔体系塑造的国际社会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中时,广大亚非拉国家要么分别成为美苏的盟国,要么寻求不结盟状态以走出第三条道路。在诸如阿富汗之类的地缘战略位置显要的国家,美苏更是加紧了争夺和颠覆。1973年,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在苏联的策动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政府,自任国家元首,阿富汗长达40年的稳定局面从此不再。达乌德借助苏联的政变并非出于信仰共产主义,因此在政变后保持了基本中立的国家政策,这引

起了苏联的不满。在苏联的策划下,有共产主义背景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78年推翻达乌德政权,但其内讧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导致阿富汗政局一片混乱,在此情形下,苏联于1979年亲自出兵阿富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10年正是国际格局风云变幻的10年,其侵略行径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中美的准联盟关系在此期间进一步巩固,两国均对苏联进行严厉的批评。中国将苏联从越南和阿富汗等国撤军视作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邓小平指出:“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④ 美国出于平衡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对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深表忧虑,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苏联撤军问题迎刃而解。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开始结束、两极格局开始瓦解,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系的正式结束。自冷战结束迄今的近20年里,世界经历了两种大趋势: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试图维持“一超”局面独霸世界,但美国的衰落和颓势明显;各种新兴力量和大国层出不穷,多极化日益明显。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尤其是冷战后迄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主要从一种宏观的全球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¹ Alex Roberto Hybel, *Made by the US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 2

^④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视野来处理国际关系，其关注地区与热点问题与国际体系的变动及转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关系也深受此影响，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态势。塔利班问题牵涉美国的中东、南亚以及中亚战略，对于美国在国际体系构建的战略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美国对塔利班的间接支持及有限接触时期（1994至2001年）

塔利班崛起于阿富汗内战正酣的1994年，而从1991年底冷战正式结束开始，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暂时呈现出一超独霸的局面，直至“9·11”之前，美国陷入一种敌人缺失的状态，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寻找敌人阶段。“在美国的印象中，敌人必须与美国足够地相似，如在地缘政治目标和军事技术上可作为一个可靠的对手。”¹ 这10年恰逢美国冷战后时代霸权的巅峰时期。尽管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独立初期的向西方一边倒极大鼓舞了西方，但西方对于俄罗斯难以消除的排斥感以及对俄内部独立运动的支持使得俄罗斯逐渐调整其过分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叶利钦1993年10月炮打白宫（议会大楼）的强硬军事行动更是显示其在民主道路上全盘西化思想的终结。尽管俄罗斯1993年之后的举措让西方不满，但俄罗斯毕竟没有回到苏联式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迹象，其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国际空间大幅萎缩，俄罗斯一时还难以挑战美国霸权，美国对于俄罗斯采取了打压与扶持相结合的方针，因为美国意识到：俄罗斯人正忍受着“令人生畏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他们面临着两个选项，即“要么继续叶利钦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艰辛，同时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和更好前景的一丝期望，或者重返共产党式的政策”。^④ 美国在欧洲和中亚加紧对共产党政权或者前共产党改名后继续执政的政权的颠覆，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打压便是明证。在东亚，美国意识到颠覆中国政权的不现实，在进行了一段时期的孤立之后恢复了接触，在此情形下美国力保东

亚局势的稳定，对于朝鲜政权保持了极大容忍，朝核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缓和。而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大国利用国际体系转型期加紧核竞赛，由于印巴均与美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因而事实上承认了两国的核国家地位。海湾战争所导致的伊拉克长期被西方打压和封锁，但基本维持伊拉克政局稳定现状为主要策略，并不谋求更换萨达姆政权，正是在此思路下，困扰世界数十年的巴以冲突有了转机，美国和欧洲的斡旋促进了巴以双方的彼此承认，巴勒斯坦自治逐渐实现，建国开始进入议事日程。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加紧对欧洲、中亚、南亚和东亚这些与其现实经济利益和长远战略意义的地区和国家的关注，对于地理位置极为特殊的阿富汗由于其长期混乱的内部局势而保持观望态势。

美国冷战结束后对于阿富汗的隐性关注源于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对于全球战略的塑造，阿富汗本身并没有丰富的战略资源，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吸引了英俄两大帝国的步伐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吸引了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但美国也吸取英俄的惨痛教训而极力避免直接干预阿富汗局势，而是采取寻找代理人式的间接干预形式。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垮台至塔利班揭竿而起之前（1992年4月至1994年8月），阿富汗国内呈现出军阀混战的局面，最为主要的政治军事派别有希克马蒂亚尔派、杜斯塔姆派和拉巴尼—马苏德派。由于杜斯塔姆、拉巴尼和马苏德有着浓厚的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背景，而希克马蒂亚尔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支持，因此美国因为巴基斯坦的缘故选择了希克马蒂亚尔作为角逐阿富汗未来政治利益的力量。希克马蒂亚尔的极端伊斯兰背景美国早已知晓，如他在1974年便建立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阿富汗伊斯兰党”（Hizb-i-Islami-i-Afghanistan）。^④ 美国在“9·11”前对于伊斯兰温和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是警觉而非打击，对美国的实际态度才是最为关切的地方，沙特阿拉伯政府便是典型的例子。希克马蒂亚尔军事能力停滞不前且与反美恐怖主义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90年代美国遭遇了多次伊

¹ Gertjan Dijink,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ographical Visions: Maps of Pride and Pain*, Routledge, 1997, p. 70

^④ John L. W. Wenhardt, *Party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Routledge, 1998, p. 2

^④ Stephen E. Atkins, *Encyclopedia of Modern Worldwide Extremists and Extremist Groups*, Greenwood Press, 2004, p. 127

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在此情形下，塔利班于1994年的异军突起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希克马蒂亚尔便被美国抛弃。

美国选择塔利班主要有三方面的益处：其一，塔利班得到了巴基斯坦和沙特的有力支持，这两国均为美国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具体训练了塔利班成员的军事和教义知识，沙特作为温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则从“伊斯兰世界大国”的身份“利用石油财富对伊斯兰教国家进行援助”，¹自然包括对塔利班给予有力的援助；其二，塔利班的军事能力超群，很快将各路军阀各个击破，呈势如破竹之势，“随着塔利班北征喀布尔，当地军阀要么宵遁，要么挥舞白旗投降他们”；^④其三，塔利班在最初并未表现出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态势，也未表现出反美态度。在美国的设想里，塔利班掌权后的阿富汗应该会成为另一个沙特，至少在塔利班正式掌权之前，美国没有与塔利班公开接触的考虑。塔利班在1996年夺取大部分国土，将“北方联盟”赶至北部山区并在1997年正式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之前立即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塔利班成为旨在期望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的新神话。塔利班对抗击俄国共产主义占领（从1979年至1989年）的成功圣战伴随着伊斯兰信仰、穆斯林的鲜血以及西方的金钱和武器装备。”^④塔利班政权的极端主义倾向以及对人权的侵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美国从维护自身人权斗士形象以及单独控制塔利班的思路出发也没有公开承认塔利班政权，而是通过与塔利班建交的沙特、巴基斯坦和阿联酋三个盟国来对塔利班给予支持，这有利于美国最大限度消除塔利班与其他大国建立关系的可能，以便独霸阿富汗。20世纪90年代曾任巴基斯坦内阁部长的阿夫扎尔·汗（Afzal Khan）近来揭露：“战略

上，美国制造了塔利班作为其代理人以便使自己能够控制中亚的能源资源。除了将中国排挤出这些能源富裕区域之外，它也算打算开采阿富汗4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那时作为一个联邦内阁部长，我是这些事件的证人”。^{1/4}这一时期，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与巴政府官员一起接见塔利班代表，并通过武器禁运法案来直接打击“北方联盟”以增强塔利班的实力。不仅如此，塔利班官员曾多次访美：1997年12月4日，塔利班官员访问德克萨斯尤尼科（Unocal）总部探讨输油管道问题，小布什此时正是德克萨斯州长，塔利班同意一笔20亿美元的输油管道交易，前提是美国承认塔利班政权，美国“似乎急于讨好原教旨主义者以夺得这个利润丰厚的管道合同”；^{1/2}1999年7月至8月，塔利班官员访问了美国许多景点，“他们所有的费用由美国政府和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支付”，该大学的托马斯（Thomas Gouttierre）“那时正充当尤尼科的顾问”；^{3/4}2001年3月10日，塔利班“巡回大使”赛义德·拉哈姆拉赫·哈希米（Sayyid Rahmatullah Hashemi）在加利福尼亚多座城市进行宣扬塔利班政权的演讲后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公开演讲，他谈及了塔利班为稳定阿富汗局势所取得的数项成就，并着重指出：“阿富汗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我们甚至不能制造一根针。我们如何能成为一个恐怖主义国家？”^⑧

不难看出，1994年以前，美国暗中培育了塔利班的发展但未将其作为首选；1994年之后尤其是塔利班1996年建立全国政权之后，美国对于塔利班仍处于一种“听其言，观其行”的观察阶段，因此对塔利班采取了有限接触的策略，但在此过程中外交承认也成为双方讨论的话题，但“9·11”事件的发生中断了美国与塔利班之间业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¹ 钮松：“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④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0.

^④ Gabriele Marranci, *Jihad beyond Islam*, Berg, 2006, p. 75.

^{1/4} “Pakistan Created Taliban During Benazir's Regime with Support from U. S., Saudi Arabia”, *Bangladesh Sun*, Dec. 17, 2009.

^{1/2} Caroline Lees, “Oil Barons Court Taliban in Texas”, *Daily Telegraph*, Dec. 14, 1997.

^{3/4} Michael J. Berens, “University Helps US Reach Out to Taliban”, *Chicago Tribune*, Oct. 21, 2001.

^⑧ “Roving Afghanistan Ambassador Sayyid Rahmatullah Hashemi's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on Mar. 10, 2001”, at <http://www.themodernreligion.com/jihad/afghan/speech.html>.

二、美国对塔利班的严厉打击时期 (2001 年“9·11”至 2009 年初)

尽管美国在中东和非洲多次遭遇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但这些袭击从未重创过美国本土。美国与温和原教旨主义国家保持密切交往，也从未将反恐置于最为优先考虑的地位。2001 年“9·11”恐怖袭击重创美国本土，“2001 年 9 月 11 日，19 名据称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阿拉伯人劫持了数架客机，向分别象征着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国会山、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发动了自杀式袭击，其中世贸大厦被完全摧毁，五角大楼部分损毁，只有国会山得以幸免。美国这个自 1812 年第二次美英战争以来本土逃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享受了近 200 年和平的国家，却没能逃过 2001 年 9 月 11 日这一天。”¹“9·11”带给世界新的启示是，国际行为体不再以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也能对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基地组织”便是典型代表。经过冷战后 10 年的发展，国际体系逐渐从美国的“一超独霸”向“一超多强”的格局发展。欧盟的扩大及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欧元成为与美元相抗衡的新金融工具，中东欧国家加快向西欧国家靠拢。俄罗斯在经历了近 10 年的动荡之后，普京自 2000 年就任总统以来以铁腕手段打击分裂主义和资本寡头，俄罗斯大国实力在不断恢复。中国在与美国的磕磕绊绊中走进 21 世纪，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在西方看来，中国正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在亚洲，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模式运作良好，不仅如此，中国还在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了独有的作用。2001 年，“金砖四国”的概念首次提出，印度、巴西、俄罗斯和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有潜力的四个国家。在美国看来，俄罗斯和中国等非西方大国正在重新崛起，这对于美国乃至西方霸权是极大的挑战。冷战后 10 年所有大国都采取了市场经济因素并很大程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促使大国间冲突诉诸武力的可能性大为减小，这正如罗

斯克莱斯所言：“只有贸易世界所代表的互惠贸易和劳动分工可以在如此无政府状态环境中避免冲突”。^④战争往往在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发生，“9·11”则让世界意识到非国家行为体同样可以策动全球战争，反恐问题顿时上升为国际社会的主题。美国在经历 10 年寻找敌人的历程后终于确信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就是敌人，美国开始以“反恐”还是“支恐”为标准来确认敌友，美国开始以“反恐”作为维护全球霸权的新旗号，“基地组织”成为美国首要打击对象。

美国反恐战略矛头直指伊斯兰恐怖主义尤其是基地组织而非塔利班，但塔利班自 1996 年以来对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的收留便构成了美国与塔利班这对“准盟友”关系中巨大的负面影响因素。美国在查明“9·11”确实与基地组织有着密切关联之后，并未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在恐怖主义中的作用等同起来，事实上沙特曾经就支持过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组织，当这些组织发动对美国驻外机构及人员的恐怖袭击之后，沙特在美国的劝导下及时切断与这些组织的资金联系，因此，美国从其与沙特交往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塔利班交出本·拉登并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是可行的最佳方案。但是塔利班在此问题上的闪烁其辞和行动上的回避让美国开始改变对塔利班的态度。尽管塔利班最初收留本·拉登主要出自部落传统而非反美目的，但事实上，“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并为将大批量生产圣战者的训练营提供庇护，圣战者在即将到来的全球吉哈德中抗击他们所认为的穆斯林世界的新敌人，即美国。”^④美国在“9·11”后将对待恐怖组织的态度而非对美国的态度作为区分敌友的标准，尽管塔利班政权并没有明显的反美举动，但由于其在本·拉登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将自己置于美国的敌人位置。塔利班宁愿得罪原本交好的美国而对本·拉登无条件的庇护有着深层次原因，除了部落制收留流亡者的遗风之外，塔利班因其极端主义教义在思想上与本·拉登有着共通性，本·拉登雄厚的经济实力又为贫穷的塔利班政权提供了巨大的资助，基地组

¹ 钮松：“‘9·11’六周年世界为何低调”，《新京报》，2007 年 9 月 16 日。

^④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s: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Basic Books, 1986, p. 25.

^④ Abdel Bari Atw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 Qae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 80

织逐渐在阿富汗反客为主,从思想上和财政上挟持了塔利班。“基地组织——一个非政府恐怖组织——在阿富汗拥有如此力量以致能使所谓的统治者避免采取联合国所要求的行动来对付它,这将表明塔利班民兵在领土范围内未能实施足够的政府控制以履行其国际责任。”¹ 总而言之,美国与塔利班的反目在于本·拉登,涉及到彼此的核心安全利益。

美国在最终决定发动反恐战争以抓住本·拉登、摧毁基地组织之前,阿联酋和沙特在美国的逼迫下分别于2001年9月22日和25日宣布与塔利班断绝外交关系以求自保,塔利班仅仅只剩下巴基斯坦一国与其有外交关系。巴基斯坦的行为并未导致美国对其疏远和制裁,反而加深了巴美间在反恐上的合作深度,美国的实际意图在于通过巴基斯坦这条塔利班唯一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继续保持对话并施加压力,以期通过有限战争迫使塔利班回心转意。2001年10月7日,美国正式对塔利班动武,但美国却不直接打击塔利班的核心区域,而是从外围着手,但直到11月13日塔利班政权的崩溃为止,塔利班也没有交出本·拉登。11月20日,巴基斯坦宣布不再承认塔利班政权,标志着塔利班失去了所有的外国承认,也标志着美国彻底对塔利班不抱希望。美国开始着手扶持一个亲美的阿富汗政府,尽管塔利班一度销声匿迹,但“除了一些积极变化如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之外,后塔利班的阿富汗拥有所有的不稳症状,有发展成新一轮内战的强烈可能”。^④ 一些塔利班成员都将塔利班政权崩溃原因归结于本·拉登:前塔利班政权叛逃者马格都姆·赛义德·伊姆纳努丁(Maqdum Said Imranuddin)就认为:“一开始,我们并不认为与本·拉登交朋友是一个错误,但是他随后在阿富汗及境外实施犯罪活动。支持本·拉登是一个大错,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另一名叛逃者阿布·巴库(Abu Bakur)认为:“本·拉登的行动看上去像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但是他摧毁了阿富汗。美国的飞

机试图轰炸奥萨马,但对于美国而言寻找他太艰难”。^(四) 美国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但却没有实现抓捕本·拉登的预期目标后,在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不得不选择具有俄罗斯支持背景的塔利班的对手“北方联盟”来组织新政权,但美国力推有西方教育背景且对美国有好感的卡尔扎伊为临时政府主席来平衡自己的影响力。在塔利班垮台之后5年内,塔利班似乎“烟消云散”,无力组织大规模对政府和美军的反击,但北约军队仍旧驻扎阿富汗以维持该国的和平。然而自2006年开始,塔利班开始大规模的攻城夺地,首先占领阿富汗南部许多城镇;不仅如此,2007年7月,塔利班还绑架了23名韩国传教士,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对塔利班的广泛关注;2008年,塔利班与北约军队的作战以及对阿富汗军政人员的袭击势头更猛,用一位阿富汗青年的话说:“塔利班无处不在”。^½ 不仅如此,塔利班在巴基斯坦边境省份也建立了政权,阿—巴边界地区成为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活动的大本营。

塔利班的卷土重来与美国失衡的中东战略有着极大关联,尽管美国获得了联合国授权而发动阿富汗战争,但正义的反恐战争却被美国利用而成为其谋求霸权的机会。美国挥舞反恐大旗对伊拉克大打出手更是将反恐战争的意义扭曲,一些学者指出:“9·11以后美国打反恐战,当时国际上还是同情美国、支持美国的。美国打阿富汗战争时,国际上基本还是赞成的,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但到了伊拉克战争,布什主张的‘反恐’就已经‘变调’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恐,因为根本就没有‘萨达姆与基地组织联系’、以及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证据。”^½ 美国将中东问题的重心放在伊拉克,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混乱局势为各种激进反美武装力量和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基地组织也不例外,“他们想让伊拉克成为一个恐怖分子所控制的国家(如同他们在

¹ Karen J. Greenberg, Joshua L. Dratel, *The Torture Papers: the Road to Abu Ghraib*,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9.

^④ Hooman Peimani, *Falling Terrorism and Rising Conflicts: the Afghan “Contribution” to Polarization and Confrontation in West and South Asia*, Greenwood Press, 2003, p. 126.

^(四) David Rennie, “Our Error Was to Back Bin Laden, Say Defectors”, *Telegraph*, Nov. 24, 2001.

^½ Sami Yousafzai, Ron Moreau, “The Taliban’s Baghdad Strategy”, *News Week*, Jul. 26, 2008.

^½ 刘晓丹、朱威烈:“美国那一套观念在中东不能生根”,《中国评论新闻》,2006年11月11日。

阿富汗和塔利班一起做的那样)”。¹ 被美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的塔利班更加加强与基地组织的同流合污,但其目标仍然存在着区别。基地组织旨在推进全球恐怖主义,而塔利班旨在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以及维持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政权。这两个目标分别让美国和巴基斯坦均不能接受,这就促使存在分歧的美巴在塔利班问题上越走越近,美巴合作打击塔利班成为既定的政策。虽然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都与美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但小布什总统却将二者相提并论,他声称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士兵类似,且将被视作不合法的参战人员,但实际情况是:“与塔利班士兵所不同的是,基地组织成员并非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④ 布什在卸任前的2009年1月15日发表告别演说中仍然辩解其对塔利班的政策:“阿富汗已从一个塔利班藏匿基地组织并在大街向妇女投掷石块的国家成为一个正与恐怖主义作战,且鼓励女孩们上学的尚未成熟的民主国家。”^(四)

三、美国交好“温和塔利班”、打击极端塔利班时期(2009年初迄今)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美国与欧洲乃至世界新兴大国的博弈主要通过中东的争夺而展开。“9·11”事件对美国的国际战略影响巨大,传统上,美国对新兴大国以打压为主,打压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合作;“9·11”之后,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安全利益的一致,在得到这些国家的反恐支持后,美国更多表现为合作为主的态势,美国的打压和武力主要面对中东地区和全球伊斯兰极端势力。小布什总统的8年任期除了最初几个月外,主要以全球反恐为主要特征。各大国抓住这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发展,国际体系“一超多强”的局面更加明显,“一超”逐渐显露出衰落的迹象。欧洲国家在伊拉克战争时遭遇了巨大的分裂,“新欧洲”与“老欧洲”的对立让欧盟的未来发

展前景堪忧,但欧盟毕竟是历经数十年考验的发展成熟的组织,这种暂时的分裂并未能影响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仅如此,在美国将反恐战争与民主改造相结合之后推出的“大中东计划”出台之后,欧盟以其异于美国的“经贸促民主,民主促和平”的民主治理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广泛好感,欧洲国家在欧盟的中东民主治理之下弥合了分裂局面,其制度建设不断推进,《里斯本条约》的最终生效使“欧盟总统”和“欧盟外长”应运而生。俄罗斯也顺利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声望甚高的普京在民主宪法的框架内不再谋求总统任期,而是全力支持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并在其当选后顺利任命为总理。俄罗斯不仅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而且通过运行良好的“梅—普”模式实际上为俄罗斯双首长体制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国力尽管持续上升,但与俄罗斯所期望的国际大国地位仍有明显差距。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东盟等国则保持了高速增长的速度,尤其是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重创发达国家之后,发达国家真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G8+5”正式被“G20”所取代,俄罗斯因其国力有限而成为最大的反对者,担心其原有在G8中的地位不保。美国历经8年反恐战争后也越来越难在国际事务中独断专行,“G2(中美共治)”^{1/4}或“G3(美中日)”等成为国际社会新的思考方向。伊朗的崛起成为海湾地区必须正视的事实,美国新一届政府试图尽早从中东战事抽身出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将中东战略的中心从伊拉克转移至南亚和中东交界的“阿—巴”地区,但阿富汗战事越来越成为美国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包袱,这事关美国恢复国力,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实际控制区越来越多,对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的袭击也愈演愈烈,2008年,“塔利班控制了该国10%至11%的领土,卡尔扎伊政府控制了30%至31%。大部分阿富汗人民和土地处于当地部落控制之下”。^{1/2} 美国新一届政府目前情形下考虑的是如

¹ Michael DeLong, Noah Lukeman, Inside CentCom: the Unvarnished Truth about the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Regnery Publishing, 2004, p. 134

^④ Peter Jan Honigsberg, Our Nation Unhinged: the Human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on Terr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 19

^(四) George W. Bush, Bush's Farewell Address, Jan. 15, 2009

^{1/4} 中国并不接受“中美共治”的提法,而是强调“多极化”。

^{1/2} Pamela Hess, “Karzai Only Control 1/3 of Afghanistan”, Associated Press, Feb. 27, 2008

何体面撤出阿富汗的同时其在阿富汗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

2009年3月5日,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言:塔利班内部的复杂因素“应被挖掘”,他举出伊拉克的成功案例,“假如你和布雷默将军交谈,我想他一定会将在伊拉克的成功一部分归因于与一些人的接触,我们视为其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但是这些人乐意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已被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的策略彻底疏远”,但奥巴马也承认伊拉克的案例并不一定完全会在阿富汗奏效,“阿富汗的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① 这些如在伊拉克一样被基地组织所疏远的阿富汗塔利班内的力量就是奥巴马认为的“温和因素”,即所谓的“温和塔利班”(Moderate Taliban)。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温和塔利班”遭致了较多质疑,美国《华盛顿时报》一篇社论开门见山指出:“‘温和塔利班’这个表述是个滑稽的反比”,并援引前塔利班政权外长毛拉·穆塔瓦基尔的话说:“尊敬的毛拉·奥马尔经常使用温和与平衡”,“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运用温和政策的好领导人。我不将他视作一个极端的人。”^② 该社论暗指塔利班成员都将自己视作“温和”,但这种“温和”与奥巴马的设想截然不同。尽管对于“温和塔利班”的存在与否仍存争议,但本·拉登的一番话却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塔利班并非铁板一块,他指出:“我们的吉哈德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塔利班的外交部。”^③ 2009年12月31日,6名阿富汗人被塔利班武装人员斩首,1名目击者声称一共有7名“温和塔利班”成员遭袭,其中1人幸存,他称:“一组温和塔利班聚集在塔林科特附近的一座房子里。一组塔利班恐怖分子到达此处并对其全部实施斩首。他们已将其中6人的首级分离。”^④ 这些至少证明“温和塔利班”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存在的。

“温和塔利班”只是奥巴马为其新战略所作的铺垫。2009年3月27日,奥巴马正式提出

“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他认识到阿巴边界地区由于地形险要以及部落制等原因而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天堂,他认为该地区“形势正持续危急”;这种“持续的危急”状态的原因在于“自从塔利班失去权力迄今已经超过7年,战争仍在肆虐,且叛乱者控制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他紧接着提出问题:“我们在阿富汗的目的是什么?”他给出了思考的方向,即美国应该真正对付的目标是“基地组织及其盟友——这些恐怖分子策划并支持了9·11袭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奥巴马批评了塔利班政权下阿富汗的种种问题,如“暴政、国际孤立、瘫痪的经济以及拒绝给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妇女和女孩基本的人权”。但他着重指出:“将伴随塔利班领导层核心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武装的返回将在阿富汗投下长期暴力的阴影”;在进行了前面的分析之后,一个“更强大的、更睿智的和更广泛的策略”便呼之欲出了,由于基地组织的跨界存在,因此美、巴、阿三边谈话才得以实现,增兵阿富汗成为奥巴马的选择,“最迟今年春天我们将派遣大约4000名美军官兵去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奥巴马并不忌讳美国正遭遇经济危机,他指出:“但不要搞错,假如我们不为它们的未来投资,我们的努力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失败”;奥巴马最后指出:“基地组织给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民的未来是——没有机会与希望的未来;没有正义与和平的未来”。^⑤ 不难看出,奥巴马在其新战略中明显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区分开来,其打击目标设定为基地组织及其盟友,其潜在含义是:塔利班可以作为基地组织的盟友存在,也可以不作为其盟友存在,不作为基地组织盟友的塔利班自然就不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正是在此种思路之下,就不难理解美国先前所提出的“温和塔利班”的概念,并打算同阿富汗政府一起与“温和塔利班”对话与合作来分化塔利班,将温和派与同基地组织同流合污的极端派区别开来。

奥巴马旨在交好“温和塔利班”、增兵严厉

^① Helene Cooper, Sheryl Gay Stolberg, “Obama Ponders Outreach to Elements of Taliban”, New York Times, Mar 7, 2009

^② Editorial, “Talking with the ‘Moderate’ Taliban”, Washington Times, Mar 18, 2009.

^③ Robert D. Crews, “Moderate Taliban?” in Robert D. Crews, Amin Tarzi, eds., The Taliban and the Crisis of Afghanist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8

^④ “Taliban Beheaded Six Afghan ‘Spies’”, Agence France Presse, Dec 31, 2009

^⑤ “Obama’s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Mar 27, 2009.

打击极端塔利班的“阿巴新战略”并非完全是其原创，实际上小布什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2008年10月便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前塔利班政权领导人在沙特进行过谈判，只是这一工作在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得到了细化和深化。奥巴马从“温和塔利班”的提出到“阿巴新战略”的推出迄今不足1年，其成效仍不明显，其短期目标在于尽快实现阿富汗局势的稳定，尤其是将部分前塔利班政权的温和派人士吸纳进阿富汗政府中来；其长远目标在于在阿富汗局势稳定后将美军的防卫职责交还给阿富汗军警部队，最终从阿富汗撤军。尽管奥巴马将塔利班内部区分对待的接触姿态得到了塔利班部分官员的认同，但美国增兵阿富汗的政策却招致了他们的反对，原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驻巴基斯坦大使毛拉·阿卜杜·萨拉姆·扎伊夫（Mullah Abdul Salem Zaeef）是塔利班阵营中的温和派，他致力于促使塔利班与阿富汗现政府达成和解，他指出：“当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所有人感到乐观。我有一些乐观地认为他会结束战争，但是当他宣布这项战略，特别是派出更多部队和派出一名武将作为大使之后，这些战略是战争的战略而非和平的战略，并且它正在增加问题”，“这不是塔利班和阿富汗人之间的问题，由阿富汗人（解决）一切都是可能的。塔利班正与他们坐在一起，我很明白，他们彼此尊重”，“当他们（指美军）增加士兵的数量的时候，穆斯林国家的外国人也正在增加他们的士兵，并且他们的士兵不是为钱而战，他们是自愿者。这正在增加该地区的问题。”¹ 尽管如此，奥巴马在2009年12月1日的西点军校讲话中宣布再度向阿富汗增兵3万，并计划于2011年7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奥巴马的撤军时间表招致了共和党的批评，但至少在2011年7月之前奥巴马是希望阿富汗局势能有较大的突破。2009年年初尤其是新战略出台迄今，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冲突仍无明显缓和迹象。2009年12月30日，美国中情局（CIA）在阿富汗的一处基地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7名特工死亡，6人受伤，据称怀疑是塔利班间谍渗透该基地人员所为。2009年12月31

日，塔利班以“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名义发表名为《侵略者的焦虑与圣战者的胜利》的2010年新年致辞，该致辞尤为强调：“所有外国占领军以及傲慢的充满敌意的白宫统治者带着他们所有现代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及他们的军事战略和技能从阿富汗撤出越快越好”。^④奥巴马对塔利班的新政策以及“阿巴新战略”走势仍需拭目以待。

四、结 语

美国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并存的国家，这在其外交政策方面尤为明显。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倾向在其全球霸权时代逐渐让位于现实主义。正是在此前提下，国际体系的转型对美国现实主义的外交产生直接影响。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个变动的体系中，美国始终处于绝对的全球霸权地位，尤其是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这注定了美国对塔利班的交往绝非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而完全是现实军事政治利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伴随着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而来的是新兴大国崛起、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新公共问题层出不穷，这就决定了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断在与塔利班的关系中转换敌友身份。美国与塔利班关系走向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关系是典型的“应激—反应”模式，虽具一定的可行性，但从长远看，美国学会如何与其他大国分享权力，国际社会共同进行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以及如何引导伊斯兰世界走出十字路口，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是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塔利班政权走向极端主义与基地组织有着极大的关联，但国际社会对其的孤立也是极为重要的外因。美国的塔利班政策从阿富汗反恐战争扩大到“阿巴新战略”体现了一定的政策关联性，但从长远看，塔利班正突破阿巴地区向索马里和也门等地渗透，因此国际社会寻求公正合理整体探索解决中东问题的路径是最终解决塔利班问题的关键所在。

¹ Ben Farmer, Dean Nelson, “Moderate Taliban Leader Warns Barack Obama’s Plan Will Make Afghanistan Worse”, Telegraph, Apr 5, 2009.

^④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Invaders’ Anxiety Versus Mujahideen’s Victory”, Dec 31, 2009, <http://www.hanein.info/vb/showthread.php?p=1166249>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ition and US– Taliban Relations

Niu Song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seen great change and turmoil. This article examines US – Taliban relations by dividing it into three periods, namely indirect support and limited contact (1994–2001); cracking-down (9/11 events to 2009), and trying to engage in the “moderate Taliban” while fighting extremist Taliban (2009 present). Given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 of “one superpower and multiple big powers” and the “fading superpower”, the future of US– Taliban relations relies on developing a reasonable Middle East policy as well as enlarging the Islamic world’s role in the global system.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South Asia and Anti– poverty Options

Qin Yonghong & Dai Yonghong

Rural poverty is part of the widespread poverty in South Asia. After independence, South Asian governments have launched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such as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s,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Rural Public Works Programs and Micro– credit Programs, to rebuild rural infra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o achieve poverty reduction and eradication. The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available anti– poverty strategy option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less– favored areas; greater access to productive resourc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marginalized groups. These measures help promote social transformation, non– 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Zuo Liancun & Jia Ning

Since the 1990s India has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looking the East.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ASEAN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showed gathering momentum. Moreover, the recent signature of India– ASEAN FTA agreement will provide more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omise a bright prospect for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act.

India’s Agenda of Stimulating Economy under the Global Finance Crisis: An Analysis of Effects

Fu Zongping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the global finance crisis on Indian economy and ass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a’s counter– measures of stimulating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policy has helped spur economic growth, trade balance and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in the short term, but failed to resolve the enduring problem with its fading effects.

Development of Garment Industry in Sri Lank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ang Pengqi

Sri Lanka’s garment industry start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has come to be one of pillar secto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le facing the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EU GSP treatment and the global finance crisis, the industry has seized the emerging opportunities to grow. Today Sri Lanka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Hong Kong for India” and attract investments from India and the region at large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has chance to contribute to this ambitious projec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Southeast Asia

Chen Jidong

The last years have witnessed paralleled developments of Sino– ASEAN and Indo– ASEAN relations. With Sino– ASEAN Free Trade Area built and Indo– 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taking effect in 2010, China and India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each other on the platform of interacting with ASEAN. Despite great potentials for cooperation